2010/11 許淑真、盧建銘「以建造來起義—《建屋》的庶民日常與社會連結的行動策略」，一年過後：原住民族災後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台北

以建造來起義—

《建屋》的庶民日常與社會連結的行動策略

許淑真[1]、盧建銘[2]
中原大學永續環境營造研究中心

Insurgence through Construction—

Action Strategy for Subaltern's Everyday Life and Society Connection of "Building Homes"

by Su-Chen Hsu, Chien-Ming Lu

摘要

台灣原住民遷徙至都市生活，已經與原鄉部落的人數比例相近，尤其是北部地區的阿美族。位於桃園大漢溪畔的撒烏瓦知部落，是少數具有花東原鄉部落生活經驗的第一代都市原住民，但因為語言、生活習俗、經濟地位等等差異的隔閡，漂流成為都市的邊緣結構。2009 年 2 月因都市發展的理由，被迫拆遷的 18 位阿美族老人，成立了成員最老、人口最少的阿美族新部落。經由部落結合社會力的抗爭與文化運動，與第二代共同完成了部落建屋的勞動工作。部落重建完成之後，居住的危機感並沒有解除，現仍朝向原住民自治和文化部落的運動持續邁進。

本文談論兩位創作者許淑真和盧建銘從 2008 年至今，在實際參與部落重建與文化運動中，利用展演的公共平台所發展出來的新起義路線。並以今年參加第五屆蔡瑞月舞蹈節的表演作品《建屋—一個社會契約的實踐》為主軸，闡述如何以原住民強勢文化進入大都會之姿，在都市中心的邊陲—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發展與小型社會的勞動互助建屋表演。在逼視不同文化共同組織與集體學習方式之下，呈現「居住」的複雜脈絡與社會現實，並期望促成公共性議題的討論與多元文化的發展。

《建屋》的行動策略在凸顯「庶民日常」的價值，並試著突破「虛假的公共性」所帶來的同化政策暴力下的社會救助觀念。透過社運團體長期的協力發聲，

---

[1] 藝術家；中原大學永續環境營造研究中心 獨立研究員

[2] 中原大學永續環境營造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博士候選人

讓社會理解了都市原住民的弱勢處境，但透過社會的「文化歧視」問題，本文也重新檢視古典馬克思主義下以「階級理論」和「經濟決定論」的運動路線，長期讓庶民意識嚴重缺席的現況。「建屋行動」的部落庶民發言主體與庶民文化的多樣性開展，是我們面對此現象的行動策略。文末亦討論運用溝通媒介的全面性對抗的策略之下，所要帶出大眾、分眾、和部落內部的行動效應。

關鍵字：文化歧視、社會契約、建造起義、sakafiyaw（建造鄰里組織）、庶民日常、建屋行動

Abstract

The number of indigenous Taiwanese who have migrated to urban areas is already close to the number still remaining in indigenous villages. In particular, large numbers of Amis have moved to the northern Taiwan. Located along the Dahan River in Taoyuan County, the village of Sa'owac is one of a small number urban communities still containing first-generation indigenous residents who remember their life experiences back in the villages of eastern Taiwan. However,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ustoms, and economic status, these individuals drifted to the urban margin. The 18 elderly Amis residents who were forced out of their homes in the nam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February 2009 have now established Taiwan's smallest Amis village, and the Amis village with the oldest population. Thanks to awareness created through a social resistance and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 second-generation urban Amis helped provide the labor needed to complete th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Although their village has since been reconstructed, the residents still have a sense of urgency, and are pursuing the goals of community autonomy and cultural villag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path of insurgence developed by two artists—Su-Chen Hsu and Chien-Ming Lu since 2008 on the basis of a public arts platform. These art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village's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movement, took part in the 5th Tsai Jui-Yueh Dance Festival with their work--"Building Homes: Realizing a Social Contract"--which interprets how the dominant indigenous culture can enter the metropolis, and exist on the urban margin--the artists' Tsai Jui-Yueh Dance Research Institute. This performance has developed a mutual-help home-building performance suitable for small societies. While gazing at a different culture's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and group learning methods, they present the complex context and social realization of "residence," and hope to spur the discussion of public iss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Building Homes" has an action strategy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subaltern’s everyday life ," and attempt to break though the social aid concept of assimilated violence brought by "false publicness." While the movement group's long-term collective voice has made society understand the deprived circumstances of urban indigenous peoples, this paper uses the issue of society's "cultural discrimination" to re-examine the glaring long-term absence of subalt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light of classical Marxist class theory and economic determinism. Our action strategy in the face of this phenomena is to promote to subject of utteranc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village subalterns of "Home-Building Activity." The end of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ctive effects of the public, segments of the public, and within the village when the communication media are used to implement a full-scale resistance campaign.

Keywords: culture discrimination, Social Contract, insurgence through construction, sakafiyaw (neighborhood building organization), subaltern’s everyday life, home-building activity

一、前言

記得 2008 年在墨爾本參觀移民博物館時，館內影片除了介紹澳洲最早的移民史，還有晚近以來，來自世界各地因戰爭、政治、經濟因素的移民，甚至近年印尼大海嘯的環境難民，有關遷徙到澳洲的歷史。同一個時間我也與澳洲「栽種社區」(Cultivating Community)這個 NGO 在墨爾本數個社會住宅菜園工作數月。在回台之前我們和菜園的居民們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發表了一個展覽， 在許許多多菜園植物標本裡面，書寫了不同語言的社會住宅菜園故事。同展場也有我們針對台灣都市原住民從東岸原鄉到西岸都會的「島內移民」作品。這個以《台灣逆境植物》為主題的＜撒烏瓦知部落河岸菜園植物＞故事，在異國也揭露了國家機器以都市發展為名，長期摧毀居住這個土地上的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企圖反應許多國家不容忽視的境內移民（殖民）背後基本生存權持續被剝奪的社會現狀，和我們該面對的社會責任。

當代「居住」議題是複雜的，但是也是不得不正視的社會現實，在社區菜園內，我們發現到不同文化間共同生活的不可逃避性，也發現了個人也可能成為這個生活圈裡唯一的文化個體。但這個絕對的生存個體，也常常在「虛假的公共性」的社會福利政策下，被同化政策的暴力犧牲。當時「栽種社區」的社區菜園主任麥可，就抱怨市政府要求他們好好管理菜園裡雜亂的景觀，但他直言真正問題是社會大眾不能理解其中的文化差異，所以也無法尊重不同文化下的生活形態。

這樣的「文化歧視」帶來對居民居住習慣的壓制，也反應在 2009 年 2 月桃園縣政府對撒烏瓦知部落的全數拆遷。大部份的人都能理解國家機器長期以都市河岸部落處於「違建」和「行水區安全」的理由拆除，但卻忽視了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的歧視。早在 2008 年我們就發現部份網路部落客對撒烏瓦知部落建築景觀的批評，主要是以「髒亂」和「不美觀」影響到他們騎腳踏車的視野為理由，希望地方政府好好「整頓」這「不進步」的都市原住民部落。

二、「庶民日常」放諸於公共平台之要義

面對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問題，透過社運團體長期的協力發聲，讓社會理解他們的弱勢處境，但面對社會的「文化歧視」問題，也不得不重新檢視古典馬克思主義下以「階級理論」和「經濟決定論」的運動路線，長期讓庶民文化嚴重缺席的現況。而在殖民社會與民族主義精英的古典社會運動者，在取得領域發言權的同時，是否也犧牲了庶民的發言權，以及日常文化與個疏經驗？還有位於不同個體間、不同時空下的邊緣處境到底又是什麼？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本文對於「庶民」一詞的使用，試圖釐清我們需要面對有關文化歧視的來源，以及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和學習的機制。這裡的「庶民」既不是台灣官方與商業操弄下的「庶民經濟」中面目模糊不清的「庶民」，也不只是近代印度 「庶民研究學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脈絡下的學術用語。我

們讓「庶民」它回到它原有的語言文化脈絡[1]，除了「庶」它原有的文化性之外，再加上人民的「民」，它的難以概念化的流動性，倒是貼切的反應無法取得主流位置的眾人。她（們）有可能是都原婦女，也可能是在都會中心上班的無殼鍋牛，它的流動性更在特定的時空處境上，沒有固定在單一個人或族群上的僵化，所以本文的「庶民」意指就是（眾）人所處的邊緣處境。因為沒有某種純粹的庶民（意識），即使在庶民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平等和權力關係，一些庶民是被統治者的對象，也是統治者。

在談論都原與原鄉災區有關社會公平正義的議題時，以及與有關「福利殖民現象」的豢養制度之下，我們是否也該試著給與部落非精英族群一個主體言說的舞台。印度庶民學派在脫離殖民精英主義和本土的民族主義的精英之下，試圖重構庶民意識，重新書寫庶民反抗歷史，尋找庶民的主體性（也就是庶民的主體意識），的確給與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發。

這個派別的領域是全面性和跨傳統學術領域，但由於自己也是精英，發現如果只限於學術文章，也只是套用一個被西方認證過的學術流派而已，但是根據這些學者的社會實際作為，發現他們並不是企圖客觀的描述庶民世界而已，他們也會直接進入到社會結構。或是說，不可能自外於社會發展，而且也開始企圖儘可能讓庶民有機會可以自己直接發聲，所以裡面的核心人物斯皮瓦克(G. C. Spivak)也發表了一篇文章＜庶民可以說話嗎？＞。

但因為這個派別的發表類型大多是文化和歷史相關的領域，並多使用語言和文字的媒介，反而忽略了邊緣處境的流動性質。所以我們如果從其他新的領域來發聲，也是很有價值的發展，尤其是結合都原阿美族日常生活裡的強項，包括建築、工藝、飲食、樂舞、服飾、信仰、農耕與野採、互助組織的集體生活等，尤其這次《建屋》全面性的文化表演和社會考察式的影像又是以女性為主，應該會發出另外一種力量，同時又可以檢視這些發聲的部落性別權力問題，不管是在部落內部或是部落外部，亦可檢視這些內容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

三、《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之行動精神

藝術展演具有傳統公眾平台的功能，也就是說它可以提供公眾表達和溝通的舞台。但常常是由精英在這個平台上發表有關公眾的議題，而非公眾在這個舞台上發表他們的言論和觀點。從部落遭拆除前到重建完成的一兩年間，我們有關撒烏瓦知部落作品的展演行動，努力的貼合部落的重建現況，以及種種內部的需求，在部落奮力文化重建的當下，我們亦在思考如何將庶民文化從日常生活情境中精煉萃取出來，但…絕大多數的發言權還是集中在藝術家和部落精英的手裡。

---

[1] 在中國古代社會構成的宗法制度，其內部以血緣關係做基礎並分尊卑長幼，以家族為中心的主要精神是嫡長繼承制。「嫡」就是元配所生的兒子，其餘妾所生的都叫「庶」。而「庶」在許多地方則是指「眾多」之意，如 「庶，屋下眾也 」《說文》；「既庶且多」《詩・大雅・卷阿》。但「庶」最主要就是平民的意思。

面對今年受邀在以「回到地球的家」為主題的《第五屆蔡瑞月舞蹈節》中，在與國際大師舞蹈作品並列的平台上，除了考慮部落整體的需求之外，庶民意識如何被呈現？它有可能成為發展對社會意識的推動嗎？它的實踐價值與其行動策略為何？

這不是一個需要「抽象概念」的年代，貼近真實社會的現實，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方式。所以此次演出作品《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除了來自部落重建的啓示之外，也呼應不斷竄升的高房價，具現讓本來是棲身之所的房屋，成為擴大貧窮陰影的現實。創作中「社會契約」的提出，是來自於盧梭的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社會契約）在當代的觀念，與實際《建屋》表演組織的演出內涵與行動。因為我們可以發現現今社會大眾獲取住屋的過程是立基在住宅私有化上，並只存在於買賣交易契約的單一取得方式，而我們的契約對象竟只是建商或房仲，和獲得一張所有權狀。

盧梭的民約論啓發了法國大革命時的人們，瞭解廢除了君權神授的貴族/教廷之後，可以建立取代他們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建立具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瞭解政治權能來自於人權天賦的眾人。這樣的創見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各種運作之後，可以發現國家官僚仍然只與部分社會力量建立緊密的關係，藉眾人之名，背叛了建立社會契約的倫理。

相對於每一個個人的渺小，國家及眾人是如此的龐大。當代社會中的許多人，生命中有越來越多的壓迫，竟然常常源自於國家社會。特別是國家結合全球化資本體系運作，幾乎全面的接收了社會結構，將之納入到國家主義當中，使得原有多樣多元的社區/社群（la commune）社會性涵構（contexture），漸漸崩解粉碎。當今，連原本是基本生存權的居住/住居，竟然也成為生命中最沉重的壓迫工具。由於看到撒烏瓦知部落在社會及國家的雙重壓迫之下，能夠藉著社會支撐和傳統共同建屋習俗文化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家園，所以我們這次演出試圖召集社會結構中不同角色的人共同建屋，從微小的社會殘片當中，試圖演練重構當代社會契約的可能想像。

利用社會招募所形成的建屋工班，以蔡瑞月舞蹈社的鄰居—「台新保代」和「台新金控」的員工為主，他們與撒烏瓦知部落族人共同組成快速建屋工班組織，藉由一次的集訓和一次的建屋排演，理解都市阿美族部落的營建組織，在共同身體勞動與共食的理解之下，也產生特定部落、特殊場域、小眾合作下的表演方式，這一切的倫理是依循著部落傳統文化，是以一種人類學的姿態，在不同文化的共同組織與集體學習方式之下，所形成的新都會建造組織。而舞蹈節下雨的現場，闡述部落族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那不怕風雨和太陽的勞動，不分性別老幼的共同建屋，正是阿美族文化的精髓。族人藉由很輕鬆的勞動建屋，每個人很真實的很老練的姿態，表演者的身體具現了真實的文化脈絡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觀眾也用這樣相仿的身體經驗去親臨與接觸，也真實交代了部落可以自立重建的重要原因。

四、「以建造來起義」的行動策略

撒烏瓦知部落的老人家從花東遷徙到都市生活，脫離原鄉被排擠到都市邊陲與文化的失落，卻打擊不了他們承襲傳統文化重建部落的精神。阿美族傳統部落建屋的習俗：sakafiyaw（鄰里建屋系統）是藉由 sakafiyaw 的首領宣布 marara’（全體出動建屋），每戶都要派人來幫忙，在共同造屋的呼喊下，也再次堅實了部落社會組織與其倫理。在阿美族傳統裡，以自然分工的狀態之下，建屋是男性的工作，婦女則是在旁負責幫忙處理雜物，但這也非一成不變的兩性分工，當家中無男性可出工時，亦需出動一婦女，可擔任修藤、編連床等較輕易的工作。sakafiyaw 是原鄉部落最小的地域團體，除了互助建屋之外，也是鄰內喪事的互助組織。

但經由間歇不斷的遷徙，適應新型式的 sakafiyaw 也在緩慢的形成中。如撒烏瓦知部落重建的過程當中，對於第一代的原住民，等於在重建 sakafiyaw 的傳統組織，以及重建 niyaro’（部落）和 fiyaw（鄰里）的社會結構；而對於沒有原鄉經驗的第二代都市原住民而言，則是在修補與原鄉原住民所差距的部落群居經驗。在部落男子年齡層人數不完整的情況之下，並且同時重建一整個部落（而非傳統的修建單一家屋），產生了兩性難以分工的狀態。在撒烏瓦知部落裡的建造，adawang（聚會所）的儀式性最強，幾乎按照傳統興建。而重建 niyaro’（部落）時，並非原鄉單一 loma’（家屋）的集體建屋，是在收集材料和公平原則之下的集體重建，鬆動了原有建屋傳統；而河邊農田的 talo’an（達魯案），則是屬於私人使用的空間，但仍保有有互助（非集體）的營建系統。

這些保有傳統與適應社會變遷的營建方式，也是部落可以重建完成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隨著第二代返回部落的第三代都市原住民 wawa（孩童），也在部落重建完成之後，開始有機會從小就能夠參與部落的群居生活，而第一代當然就背負起這重要的文化傳承者的角色。

所以當現今建築技術的演進與共同建屋系統的崩解，讓建築資金高漲及營建技術專業化，也是對於原鄉傳統集體營建意識的摧毀，當然也是一種易於統治管理的文化滅絕手段。於是營建技術與權利成為少數人的專利，也開啓了大多數人被宰制的命運。大漢溪群的阿美族部落，承襲了花東原鄉的海岸與河岸生活，是在都市邊陲發展日常生活的建構；阿美族達魯岸（工寮或農寮式的小屋）的生活它保有對自然環境營建能力的維繫，也具有文化長遠發展的影響。但國家體制對都市原住民部落的拆遷，就是對其日常文化生活的摧毀，而這些達魯岸集居而成的自然聚落被拆毀的原因，常常是源自於都市居民休閒觀光生活的觸角延伸，但卻也拆毀了一個民族與文化生活維繫的唯一機會。

都市原住民部落日常生活的建構，存在於他們水岸生態＋部落生存的經營模式；存在於豐年祭儀式建立下，部落政治社會組織的完整；更存在於部落鄰里組織及家族親友協力的建造。部落的重建就是一種起義，而在部落裡持續傳統阿美生活，更是對總體社會表達一個更嚴厲的抗爭。而《建屋》作品的運動形式，則

是藉由社會契約招募社會人士的方法，透過與部落族人集體親手興建一間房屋，也是另一種新型態的起義。這個看似部落日常生活的再重現，是新文化意識下的再建，人們透過不同城市、不同民族、不同身分、不同職業的合作，立基在藝術家發展出來新建屋技術，也就是利用了國際運輸棧板廢材，採用工地模板支撐技術和傳統穿斗工法，所發展出來的無釘簡易建造，並落實在盧梭的社會契約精神，以及阿美傳統 sakafiyaw 的建造系統下，讓其具體的實用功能的進展，內化為人人都可為的營建技術。

五、部落庶民婦女－被沈默的政治與文化的踐行者

《建屋》的現場表演一共有三個畫面來組成：「快速建屋」、「社會考察訪談影像」、和「就地埋鍋造飯」。快速建屋建材的重量和尺寸都經過設計，所以婦女們可以輕易的拿取和搬動，可以輕鬆的參與建屋的行列。再加上旁邊的兩組表演，是考慮以部落婦女們為政治與文化的實踐者來設計的。現場的煮雞酒主要是由部落年長的婦女們來表演，而社會考察訪談影片的主述者也是由部落年長婦女們來擔綱。除此之外，表演中針對部落婦女日常技術的表現，試著突破語言對庶民婦女較不利的再現管道，也重新掌握如何呈現它文化的日常性，以及如何突破主流社會對於部落片面的文化想像，立基於真實文化的總體，如建屋和飲食的並重、日常性與儀式性歌舞的並重等。當然這裡還包括觀眾看不到的建屋工班成員們分享來自部落的飲食，以及日後共同參與部落 pakelang（完工捕魚祭）的儀式。

國際上有關原住民傳統知識的重申，是架構在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上，祕魯卡加馬卡（Cajamarca）的人類學家 Ana De la Torre 更重視傳統農村婦女們的農業經濟生活對生物多樣性的巨大貢獻。她描述著位於高海拔的安第斯山的農婦們，扮演著種植、耕作、收成，也扮演著食物處理、保存、淘汰和家畜的養殖，在食物烹飪上也是家庭食品安全與成員健康的保衛者。撒烏瓦知部落的婦女也如她們一樣，在傳統觀念裡，在生活物資夠用之下，她們也實際扮演著生物多樣性的推手，她們成為原住民傳統農業技術和教育的文化攜帶者，也決定這所有的變化，並且穩固的架在部落傳統文化慣習和與部份的社會經濟上。Ana De la Torre 認為瞭解生活在安第斯山中的她們，更可瞭解安第斯山植物遺傳資源的保育、演化和使用，進而更能藉此瞭解安第斯山整體的環境生態。而瞭解撒烏瓦知婦女們生活慣習，也是瞭解秀姑巒溪和大漢溪河岸整體環境生態和重要的生態知識來源。[2]

而《建屋》的訪談與剪輯主要在兩個歷史脈絡上：一為東岸的原鄉傳統，二為西岸的遷徙與重建。 剪輯內容依序為：1.花東原鄉阿美族建屋的傳統；2.都市

[2] 這個部份的研究可見於：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2010，＜撒烏瓦知部落水岸生活的重建＞，《第四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主流與支流的匯流—災後的文化再生》，頁 28-41，台北：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原住民在都會區住屋的取得；3. 退居都市邊陲時，為何選擇符合原有花東生活模式的河岸；4. 重建時照著傳統文化建屋的互助系統。而訪談的對象除了部落年長婦女們，還加入一位男性教友對於原鄉互助建屋的緬懷。另一位澎湖眷村婦女，在訪談和剪輯策略上，經由長達十年的遷村與眷村保留的經驗，由她較為精準使用語言的能力，帶出部落庶民婦女無法藉由言談表達的部份。影片也試圖反應部落婦女長期不被社會所理解的原因，一是社會大眾對傳統阿美族母系社會的誤解：因為阿美族母系主要在財產和血緣的繼承上，領袖制度與年齡階級是阿美族部落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都由部落成年男性為其組成份子，所以統治與公眾發言權仍由男性主導。二來則是反應長期都原庶民婦女身為社會運動者其主體話語的缺席：運動組織和領袖用各種形式的沈默來面對庶民婦女，在許多公共傳媒中部落庶民婦女擁有的形象，只是在街頭「空喊口號」或是「宣讀稿子」而已。

因撒烏瓦知部落頭目欣契馬躍牧師，曾經歷過原鄉鄉土神學運動，也有長達數十年在高雄爭取原住民漁工權益的社會運動經驗，所以在部落成立與抗爭時期，可以觀察到在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撐下，其處理事務的模式也能符合時代對於性別平權的要求。所以當我們用西方傳統概念去處理精英與庶民之間的權力問題時，會因為「女性」這個第三個概念而打破，但我們又如何去面對男性庶民和精英婦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呢？透過撒烏瓦知部落現有政治結構去思考，會讓人重新檢驗現有的性別研究是否也被全球化了。在殖民統治下傳統有了變化，而其中富爭議的傳統常被視為性別平權者所要對抗的對象，婦女變成被象徵的傳統習俗，而對傳統的再造大多是通過對婦女在社會中權利和地位的爭奪來進行。但進入到庶民婦女言說主體被控制的場所，我們不禁要問：哪些地方是不容許庶民婦女說話的？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抑制？它的歷史來源是什麼？什麼時候、什麼話語可能揭穿甚至動搖官方的話語？西方女性主義這樣國際框架思想真的適合在部落嗎？

部份在部落工作的女權運動者，在為性別平權爭取時，不知不覺的否定了文化，這是否也會成為另一個層面的「性別殖民現象」？在否定文化處境的平權爭取，是輕忽了民族自覺的力量對於部落發展的重要性，但面對不同族群的性別平權爭取時，部落如何在傳統習俗下發現其發展的困境，這是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民族自覺運動？

六、建屋行動之媒體策略及大眾、分眾、與部落內部的意義

抗爭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溝通。對內團結內部組織並激起共識，對外尋求官方與社會瞭解，爭取自身或族群的權益，所以都可作為一個重要的宣誓，表明自己的立場與態度。而街頭運動的抗爭就是運用主流媒體的運作邏輯，達到對社會強而有力大面積的宣誓，也常常擁有短期性的實質效果。但何曾幾時，運用主流媒體運作的街頭運動竟也漸漸貶值，尤其是握有權力者也開始學會運用街頭運動的技術來鞏固群眾進而影響決策，在看似爭取群體利益，實而謀求成員的個人

利益與政商關係，往往才是左右運動的關鍵。

在街頭，訴求因為媒體的選擇性報導和官方的不理會越來越模糊，常常只剩下抗爭的形式。為什麼利用主流溝通媒介的精準運作，卻會常常沒有效果？街頭的抗議聲和 slogan 化下的文字，為什麼無法符合訴求者不同文化下的思想、社會、政治、與知識系統？而對於訊息的接受者，他們藉此意識到什麼？選擇這樣媒體運作的邏輯，可以對應於多元文化的需求嗎？是以他們為主體有力的發聲管道嗎？

《建屋》作品是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提出實踐的對話，就是小面積、不同的特定族群、長期性的以文化傳遞和族群相互理解為基底的行動策略。而利用藝術作品最為媒介，是它含納的解放性和秩序性，常常是鬆動原來結構的微妙觸媒。觀眾在觀賞《建屋》現場表演時，可以意識到作品架構在三個不同結構的倫理層次：一是部落內部和彼此之間關係的真實，觀眾可以直接意識到一個個有歷史文化脈絡下的勞動身體及其社會組織，並以較為總體文化的樣貌呈現。二是觀眾和社會招募工班（也就是台新員工）用真實的身體去參與，建屋表演房屋落成之後，按照阿美族傳統習俗，跳舞去穢祈求居住平安，主人更招待參與工作的人員共食，觀眾在某一種層次上是用味覺和肢體去欣賞，而台新的員工既是表演者，也是文化欣賞者，更是用勞動的身體去瞭解，這樣的表演與觀眾的互動的親密關係，超乎其他的媒介。三則是以下我們要探討的，這樣顯露的形式對大社會的意義。

面對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問題（也包含了最近的農民生存問題等），透過社運團體的協力發聲，理解了都市原住民基於社會公平正義的準則下的弱勢處境；但除了聲援和表示同情與憤怒之外，作為社會大眾的我們，卻隱匿在晦暗不明的社會結構裡，忽略了個人社會位序上的社會責任。這次演出針對社會意識的推展上，希望建立一個辯證的平台，和擴大社會意識的功能，並依社會群眾和社會議題提出三個策略。

一、大眾媒體的策略：主要是對於當前「社會住宅議題」和「環保議題」的深入。在當今「社會住宅」的議題，大多著重在計量的住宅理論，《建屋》要碰觸的是被忽略的「文化差異」、「民族與社區差異」與「自力建屋權剝奪」等議題的探討。在「環保議題」上，一方面探討現有經濟體系與環保議題的關聯，也探討物資的回收系統，如何在環境科學及經濟學理之外，衍生出廢棄的工業物質在庶民生活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之間的雙向解構。

二、分眾群體的策略：在「社會運動」上開創探討社會意識構成的多元路線發展，以及脫離主流結構控制的多元發聲，尊重多元文化的主體位格；對於「建築學界」希望提出建築營建權下放的探索，以及探討當代原生建築的形態，包括立基於「生存需求」以及面對工業廢棄物資的多元文化衍生，而不只是著眼在自然材料和建築形式上。針對「藝術界」有關於形式原點的討論，以及藝術生產與社會之間的倫理，如在舞蹈界保守的運作之下，思考如何到回到舞蹈的原點以及它文化的根源性。另外，這次參與表演所構成的小眾組織（個人及企業），開始

演練小眾意識的構成，以及社會小眾如何建構新的社會位序及社會責任。

三、自我群體的策略：部落環境的形成及維護，來自於具有部落自力營建的能力，在平台上展演的效應，是對大量工業回收物資成為營建材料及工法的持續發展，其次是從建築技術中，發掘出原住民文化的自我意識。在部落短期的實質效應上，可以進而發展下一個建造的技術和形式。

這幾年在社會公共平台的表現與意義（也包含 2008-2009 年的《植物—新樂園》系列），就是希望取得在部落、街頭、藝術空間、美術館、表演舞台、學術論壇、傳播媒體的綜合效益，讓多元發聲與其有效性的社會溝通發酵，希望在改變眾人既定成俗的價值的同時，也能鬆動原有社會結構，開創社會運動新的方式與產生新的社會倫理。而面對可能鬆動的微小縫隙，庶民的日常性就相對的重要，因為真理常常躲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而那個地方就是庶民日常的現實，讓我們從「傾聽歷史中微弱之聲」開始，並理解歷史變遷的代理人不是別人，而是「起義者」，就是「庶民」。

參考書目

Gayatri. C. Spivak, 1988, *In Othe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Mario E. Tapia and Ana De la Torre, 1998, *Women Farmers and Andean Seeds*, Rome: IPGRI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

卡馬拉．維斯威斯瓦藍（Kamala Visweswaran）著，林德山、張曉梅譯，2005，＜輕微的言說，庶民性別：民族主義思想體系及其歷史編篡＞，《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李亦園等，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世界》，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阮昌銳，1969，《大港口的阿美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拉塔．曼尼（Lata Mani)著，張曉梅、林德山譯，2005，＜富爭議的傳統：關於殖民地時期印度殉夫自焚的爭議＞，《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義華，2009，《後殖民知識界的起義—庶民學派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劉斌雄等，1965，《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盧建銘、許淑真、張進財，2010，＜撒烏瓦知部落水岸生活的重建＞，《第四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主流與支流的匯流—災後的文化再生》，頁 28-41，台北：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許淑真在墨爾本 Fitzroy 一處社會住宅菜園內，與移民自阿富汗的姐姐薩伊德和妹妹阿敏娜。同菜園的越南朋友會常常來幫忙不善種植的祖母。(盧建銘/攝影提供)

位於香港東九龍和將軍嶼之間的鯉魚門社區裡，將被拆除的寮屋。（許淑真/攝影提供）

2010 年 8 月撒烏瓦知部落在即將合法承租的土地上舉辦重建壹週年感恩豐年祭。（許淑真/攝影提供）

《建屋：一種社會契約的實踐》表演，由撒烏瓦知部落族人和社會招募來沒有建築經驗的建築工班，由台新金控和台新保代員工組成，背後是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社。（許淑真/攝影提供）